

目 录

- 悼念张凤鸣烈士 王忠慈 (1)
- 回忆我参加地下党游击队的经过 周云峰 (14)
- 解放前夕西南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 陈文伟 (18)
- 我参加安龙县解放初期工作的片断回忆 罗胜祥 (27)
- 龙广地区剿匪片断 贺腾俊 (36)
- 安龙城区第一小学创办简记 (清光绪—民国时期) 王学文 (41)
- 安龙县私立安义初级中学创立始末 朱朝甫 (46)
- 安龙县师范学校史略 (1911年—1949年) 朱朝甫 (67)
- 发掘“王坟”见闻简记 (民国三十二年) 罗元亮 (78)
- 龙头山下开办陶瓷玻璃业的兴衰录 黄明楷 (81)
- 木咱恶霸陆尧阶父子罪行录 陆修德 王天恩口述
韦铭恩 何顺刚整理 (87)
- 恶霸地主蒋德安弟兄的罪行 王兴民口述
韦克政 贺启锐整理 (91)
- 记民国十八年安龙县城大火 汤璧光 (98)
- 日本飞机轰炸安龙县城见闻 罗元亮 (100)

悼念张凤鸣烈士

王忠慈

张凤鸣同志，号于岗，化名刘诚斋，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西门坡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他父亲张玉铨为人正派，目光高远，不满于军阀统治的世道，以正义之道教子，养成了张凤鸣同志自幼个性刚毅、品行端正、勤奋好学的作风，奠定了他以后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基础。他在安龙县两级小学毕业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冬在安龙中学（当时盘江八县唯一的中学）第二期毕业。父亲鉴于儿子成绩超群，必须再予深造，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出力，便变卖了田产，送儿子去南京读书。

一九三〇年以后，张凤鸣到南京进了安徽公学高中部，在此期间，他喜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受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在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时，曾亲笔眉批：“阶级的悬殊使这两个童年的好朋友疏淡了。”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对阶级分析的认识就有深深的感受了。他在南京，结识了教育家陶行知和爱国人士沈钧儒等，沈老曾将自己写的《寥寥集》亲笔题名赠给他。这时，他已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向马列主义的思想。他攻读过的《列宁文选》、《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本藏原惟人的《唯物史观》、以及

《响导周刊》等，在封面或首页亲笔写了“凤鸣一九三三年读于南京”的字迹。

此后，张凤鸣曾肄业于武汉大学。一九三五年曾到重庆进过“高等警官学校”，他由于不满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未及毕业，中途就退回贵阳了。

一九三六年，张凤鸣回到安龙，任安龙槐山小学（今城区一小）校长，因办学有方，成绩显著，颇得地方人士称赞。一九三七年，安龙县长李旭亲下手条，请他任安龙中学教导主任。他办事认真负责，以身作则，友爱学生，循循善诱，着重思想教育。他除讲授正课外，还向学生朗读他所写的诗歌。如：

“地主眼里看佃户，
好似一棵摇钱树；
佃户眼里看地主，
好像一隻吃人虎。”

又如：“初一望到十五，
十五望到三十，
还了半年米账，
无钱再买盐吃。”

又如：“生活在这里，忘记了阳光；
好像处在酷刑拷问的牢房。
沉重的叹息，无人听到；
辛酸的热泪，总是盈眶。”

这些诗作，是他当时对地主阶级的揭露，对剥削的诅

咒，对黑暗社会的憎恨。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感动了不少青年学生。

课余，他还和当时留学南京、贵阳回来的思想进步的青年，组织一个“桅峰学社”，名义上是为学生补习功课，砥砺思想，切磋文艺的地方，实际上是宣扬马列主义思想的场所。他和友人说：“敢说、敢骂、敢哭、敢笑，为人就应有这个性格；一根钉子一堵火，就是不怕这些恶势力，就要树立正气；就是要做硬骨头。”在他的卧室里，挂有一付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因此，朋辈给他一个绰号“张正气”。在那不合理的社会里，这个绰号却恰如其分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和作风。

他的思想言论和作风，惊动了当时的县长和豪绅。安龙中学的校长被吓倒了，生怕丢了他的“乌纱帽”。他们对张凤鸣大为不满，因嫉妒而百般刁难，制造舆论说：“张凤鸣孤芳自赏，将自讨苦吃。”

一九三九年——四〇年，张凤鸣到普安县任教育科长。他到任两个月后又回到安龙来，他说：“普安是滇黔公路必经的要道，是个好地方。”他在安龙邀约了四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去普安工作。到普安后，安排其中一个任城区小学校长（当时普安无中学），另外三个都安排在“民众教育馆”（其中一个任馆长）。他和当地卫生所所长何纪民（贵阳人）配合起来，展开了一些社会活动，如举办全县城乡小学儿童健康比赛，这在普安是个创举，给儿童的父母很好的印象，群众给他很高的评价。尤为出色的是民众教育馆的宣传

工作，坚持每天出一张简报，除转载抗日战报、省县新闻外，还宣传了抗日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民主的必要性，独裁专制的危害性等等。民众教育馆还设有一个书报阅览室，经常开放，展出的除一般书籍外，还有《苏联的社会》、《苏联的政治》、《苏联的经济》，列宁、斯大林著的小册子等；一般的报纸而外，还有《新华日报》；一般的刊物而外，还有解放区发行的《群众》、《全民抗战》等。这一星星之火，燃遍了普安城乡，而且波及到滇黔公路上的邻县盘县和晴隆。这时期在盘县合作金库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德藩和张凤鸣已结为知交，往来密切；晴隆的进步人士也常来和他联系。这些活动，吓倒了普安县长车祖瑜；国民党普安县党部书记长黄龙渭尤为嫉妒。张凤鸣察觉周围形势不利，后来到专区（当时专署设兴仁）开会，就不再回普安了。安龙去普安四个青年也先后辞职离去了。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互相争权夺利，扩充派系势力，但对共产党人则采取一致的残酷手段。皖南事变，敌人追捕共产党员高德藩、肖维亮二同志；在千钧一发之际，张凤鸣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脱险，安全离黔。

皖南事变后，贵州地下党员大都撤离，张凤鸣则离开了盘县，到贵阳市政府任民政科科长，后又任贵阳市第二区区长。他办事认真，秉公正直，凡事以老百姓利益为重，颇得群众爱戴。有一次抽壮丁，他理直气壮地把国民党师管区司令的人力车夫抽当壮丁，扫了一下国民党官僚豪门的威风。

广大市民引为快事。二区民众送他一块两尺多宽的玻璃框匾，里面写着“公平正直”四个大红字。张凤鸣对人真诚热情，对青年人则以弟兄之情相待。他不但对本区的青年学生关心爱护，而且通过同乡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贵阳师院和贵州农学院的许多青年学生，进而往来亲密，结成知交。青年学生也很喜欢和他交往，因为在他那里不仅能得到他的热情指导和鼓励，还可以读到难以得见的解放区的刊物《群众》、《解放》、《全民抗战》等，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一类马列主义的书籍。同时，他通过高德藩等同志的通讯交往，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思想行动都按共产党人的要求去想去做。黔南事变时，他准备在贵州展开抗日游击战。他坚决表示：“无论日本人打到那里，我决不离开贵阳。”他把岳母及妻甘云鸾、女儿敏仪，疏散去郊区青山坡，把儿子锡銮送回安龙，自己仍旧住在贵阳，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后，张凤鸣由地下党的推荐，到了重庆，出席了毛主席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同志。同时，高德藩同志特来会他，送他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高德藩的介绍，《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同志在该报营业部三楼接见了。他和高德藩聚首数日，畅叙离情，情意缠绵，几不忍别。临别索书，张凤鸣就以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书高德藩，表示他坚定的信念。他热忱要求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但根据斗争的需要，党希望他仍回贵州从事政治宣传和发展进步力量的

工作。

一九四六年，由于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逃在贵阳的权势们，纷纷争往京、沪、汉去争夺胜利果实，留下的多数是贵州的派系头目，也有湖北系、四川系的实权人物。各派系间仍然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各保实力，甚至寻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这样复杂斗争的情况下，张凤鸣虽然在他夫人甘云鸾伤逝之后，仍然不懈地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同年年底，张凤鸣打进了贵阳中央日报社做编辑，多方联络同志，发展进步力量。这时，中央日报社里向来把持实权的总编辑丁守镇（湖北人）升任了社长，更加跋扈，大肆排斥异己，凡是他认为非湖北系的编辑、采访和职工，借故全部辞退，这就影响了进步力量。张凤鸣虽未被辞退，却愤愤不平，组织了被排斥的二十多人，列举了丁守镇的罪恶事迹十几条，印发传单，抨击丁守镇的胡作非为，以伸公理。同时，他还组织了被排斥的能写作、有作为的同志筹办《农报》，但在组织行将就绪时，遭奸人破坏，印刷器材告缺，以致功亏一篑。一九四七年贵阳《力报》改组，他竭力鼓励肖奇富（共产党员、水城人，师院毕业生）接办了《力报》，并为之出谋献策，以顾希均为总编辑，毛有光、洪之贵等为编辑，张凤鸣、蒙昭、王忠慈等为编辑并社论特约撰稿人。大家商讨办报的方针是“半面向左转，向前一步走。”当时贵阳所有的报纸都称共产党为“匪”，独《力报》一家不称为“匪”，被国民党下令警告。抗战刚胜利，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迹未干，而蒋介石就宣布“对日贸易开放”，

《力报》社论就以此为题，由王忠慈主笔，给予抨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市长杨森，以整顿市容为名，勒令市民拆修房屋，借以勒索敲诈，《力报》便发表社论《谈市容》和《市内公共卫生》为题，以反对其劳民伤财之举。贵州省教育厅搞“用人唯派”，把学校变成政客竞选的场所，《力报》便发表社论《招考期间漫谈贵州教育》和专栏《贵州教育之我见》等文章，以反对他们的派系斗争。这些社论文章，张凤鸣都起了主导作用。他还经常在《民意月刊》、《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文章，如《反内战反饥饿反美帝干涉》、《熄邪说，正人心》、《鸡脚杆上刷油》等等，都起了抨击旧社会的作用，达到文字斗争的目的。其后，《力报》总编辑顾希均发表了《从京沪各报看刘伯承将军南下姿态》，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匪张目”为罪名，杨森密令宪兵特务查抄封闭了《力报》报社，先后逮捕了顾希均、李思齐、毛有光、洪之贵（两人均是师院中文系毕业生）等同志，并下令通缉当时已去水城筹款为排版铅字购铅的肖奇富同志。张凤鸣和其他同志未住报社，幸免于难。从此以后，肖奇富化名李晓天，决心转入地下斗争，潜回贵阳来会见张凤鸣，张见他态度坚决，信心十足，诙谐地说：“你是提着脑袋在耍呀！不怕吗？”肖奇富对此至今记忆犹新，深感张凤鸣对他的信任和鼓励。

一九四八年，贵州地下党组织活跃起来了。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抵筑后，即与张凤鸣取得联系。经党组织批准，张凤鸣于是年八月在三民东路皂角井某室宣誓加入中国共产

党。组织上分配他担任政治宣传、联络、情报、统战及部分组织发展工作。此后，他更加繁忙。他虽身患重病，但仍日以继夜，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每天必跑大十字“文风书店”一趟，因为重庆九二四信箱（地下党联络信箱）转给张立的信及散处各地同志的来信，均写交“贵阳大十字文风书店于春山（张立同志的化名）收”，由文风书店的店员交给张凤鸣，再由他尽速转给张立同志。张凤鸣进入《中央日报》社后，为了革命工作能顺利进行，对报社里各部门的人与事的情况，都作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力求做到心中有数。他的具体工作是上夜班，校核清样，可以深夜出入报社印刷厂。校正稿纸上的几个字或一句话，是编辑应有的职权。有一天，有条消息是“蒋总裁飞返陪都”。他巧妙地有意把小样上的“陪”字改为“阴”字，版面原样不动。当天报纸一出，报童一早就带到大街小巷去了，高喊：“中央日报好消息”；读者一见“蒋总裁飞返阴都”，大家心照不宣，捧腹大笑。这真是大快人心！这一类“怪”新闻，那时屡见不鲜。后来，在南下解放大军西南服务团办公室编印的《贵州资料》小册子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报：“最近的贵州省政府公报中说，‘近来，中央日报立论怪癖，定有匪特混入’。”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张凤鸣部分斗争的方式方法。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妄图苟延残喘，提出停战和谈，同志们请张凤鸣对和谈前途发表意见。他说：“我们的党，经过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了。党中央掌握全面情况，

党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该和就和，该战就战；和有和的办法，战有战的措施；我们不要妄加揣测。”这表现了他对党的信念和高度的组织性。当时张凤鸣兼任“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讲师，在该团讲课时，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讲得有声有色，而学员听众为之骇然。三月一日，他去上班的路上走到富水路，两个便衣特务把他架走了，把他关在城东文昌阁，整整关了一个星期。释放回家这一天恰是星期日，家里坐着几个知心的同志，他儿子锡鑫也从清华中学回到家里。同志们问长问短，他愤激地讲述了国民党监狱里对犯人的种种酷刑虐待，给犯人吃的饭里尽是砂粒稗子，霉气扑鼻，难以下嚥……。同志们听呆了，他儿子哭了，他却沉静地对儿子说：“哭，有什么用？哭，就能把蒋介石哭倒么？”有的同志劝他暂离贵阳，他却坚强地说：“怕什么？吃不掉我！”

他出狱后，时时受到秘密监视，但在经常有特务跟踪的恐怖情况下，他仍然巧妙地、无所畏惧地尽力完成联络、情报、统战等任务。六月的某天，张立约定他在河滨公园碰头，他发现后面有特务跟踪，便直往泰和庄的桥头，很快闪进一老百姓家中，才把特务甩开了。他在约定的地方留下一张纸条：“芳姐：我发现一个小白脸在追求你，希你以终身大事为重。”以后，他发现张立同志被特务盯梢，便通知他立即转移。张立转移到边区后，组织上也通知张凤鸣必要时转移，但他考虑到还有些同志必须联系和照顾，以自己担负的联络工作为重，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坚持留在贵阳。以

后,刘谿铸同志要到兴仁县去做国民党某部队的策反工作,张凤鸣给他安顿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住处,使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张鸣正同志从重庆调来贵阳工作,张凤鸣介绍他在威西门“复源长米店”工作,别号“张老板”,以作职业掩护;后来又帮他转移到盘八游击区任团政委。宋治平同志在贵阳露面后,张凤鸣介绍霍明纲同志同他见面,第一次在东山脚下接头,指示霍明纲回师院去做发动青年学生的工作,并约定第二次见面再谈。但到第二次时因宋治平在永初中学被捕,已会不上面了。张鸣正的夫人刘淑贤到了贵阳,张凤鸣便委托黄先和同志为她安排了妥当的住处,让她隐蔽下来。岳景琛同志的职业,也是张凤鸣介绍的。张凤鸣的社会关系很广,对人与事,善于观察和分析,组织上交给他的联络工作,很合适,他做得很出色。

同年八月,特务机关清查被捕的地下党员岳景琛的职业介绍关系,查知他与张凤鸣密切相关,因此,于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次逮捕了张凤鸣,把他关在大西门内中山公园的监狱里。在两个多月中,他受尽了种种酷刑。敌人主要是搜捕张立同志,怀疑张凤鸣就是张立,要他招供。当时张立已转移到边区,张凤鸣便以假乱真地说:“我就是张立。”不久,敌人发觉张立已经转移,受了愚弄,便恼羞成怒,对张凤鸣屡施酷刑。以后又追查张鸣正、张老板,张凤鸣又谎他们说:“我就是张鸣正、我就是张老板。”弄得敌人真伪莫辨,疲于奔命,徒劳无功,只得倍加酷刑:灌辣椒水,用上千度的强光直射双目,炮烙前胸后背,坐老虎凳。他的左小

腿被酷刑折断了，却没有使他屈服。他除了给反动派以暴斥痛骂外，敌人从他口中没有得到一句所希望得到的话。有一次炮烙之后，他昏迷了几天，伤口化脓生蛆了。难友们找了一些药给他敷裹着，他醒过来后，以为是反动派给的药，便大骂道：“老子死也不敷这个臭药！”难友们立即说明，这是难友们设法特地为他找来的，他才接受了。

他对难友们十分关心。从狱中幸存出来的人说：有一次，一个姓李的难友从监狱的厕所中逃跑出去了，不幸下午又被抓了回来；晚上，敌人要惩罚他，便放几只警犬去咬他。这时，张凤鸣立即挺身而出，据理辩护，怒斥敌人惨无人道的暴行。敌人理屈词穷，被迫撤走了警犬，李才幸免于难。张凤鸣同志在狱中，得到难友的信任，难友们有了困难问题，都愿意找他帮助解决；他见到难友中有人情绪低沉时，他就乐观地去鼓舞其斗争勇气。难友们相信他的观点正确，立场坚定，有热烈的阶级感情，所以都乐意接受他的意见。从他入狱以后，和他有密切联系的张立、刘锦铸、魏鸣正、高德藩、李晓天等同志，和他有亲密交往的蒙昭、霍明纲、王忠慈等进步人士，全都安然无事。这表明张凤鸣同志在狱中，坚持党性，受尽苦中苦，仍然忠贞不屈，坚定不移，没有出卖同志，没有连累朋友。所以敌人说：“张凤鸣极为顽固。”最后，国民党的谷正伦亲自密令杀了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夜十一点左右，贵阳市红边门外沙河，黑沉沉的一片，突然有汽车的轰鸣，有人声的吆喝，一阵骚动；沉静了刹时，就听到有人高呼：“共产党万

岁！”“毛主席万岁！”接着便是一排枪声。张凤鸣同志等十多人，在“谷胡子”的屠刀下英勇就义了！

这时，张凤鸣同志才三十九岁，遗有妻子及二子一女。现悉，其长子张锡奎，曾在西藏做医生工作；次女张敏仪，在北京化工二厂工作；三子张文奎，现在云南昆明，易名崔明山。

同月十四日，以杨勇、苏振华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以张立同志为代表的贵州地下党在贵阳胜利会师；十五日，贵阳解放了。张凤鸣的继室夫人刘文芬、儿子张锡奎、保姆张朝珍、以及至友黄先和、蓝泽炯、霍明纲等同志，都到沙河来收尸。目睹张凤鸣同志的遗容，他那正气凛然而严肃可亲的神态，依然如故；临刑时穿着他十年前的那件人字粗呢大衣，已褴褛不堪；大不同者，乃面容憔悴，颧骨高突，满面胡须，消瘦如柴，左眼球已被炸出来，前胸后背无数烙印，伤疤犹新，左小腿已被折断，胸部中了七弹。这就是革命烈士张凤鸣同志的遗体。亲友们买了棺材，就地葬在他的殉难处——沙河。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共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在贵阳市召开了“为贵州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追悼大会”，张凤鸣同志是被追悼的烈士之一；《新黔日报》刊登了他的传略《张凤鸣同志》一文。党组织给他作了结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并书面通知了他的亲属。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企图颠倒历史，不少革命烈士被诋毁，否定张凤鸣是其中之一。以后，组织上根据党的正确政

策，再度给张凤鸣同志作结论，恢复“中国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再一次公函通知他儿女工作的所在单位。

张凤鸣烈士的遗骸，于一九六〇年由贵阳市民政局把他和其他烈士的遗骸一道迁葬于贵阳白花山烈士公墓，立有碑石记载。

张凤鸣烈士英勇就义已三十三年多了，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悼念他。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八三年清明写于安龙

回忆我参加地下党 游击队的经过

周云峰

我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了王秉璽同志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当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完全是在地主恶霸杨永康的勒索逼迫下，试图反抗，险遭不测，经王秉璽的搭救，并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才跨入了革命阵营的。

我家几代都是龙广街上杨永康的佃户，从祖辈起，每年秋收后都要把晒干扬净的稻谷送交杨家。我父亲和哥哥去世后，送租的责任便由我来担当了。每次送租，事先要找人换工，五个强劳力，每天一次，需四天方能把六石五斗租谷送齐扛进粮仓。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薅二道秧，杨家佃客集中在一起歇气吸烟摆谈时，我说：“每年送租子的事情，我觉得下贱得很。我们辛辛苦苦种了田，打下粮食，租子又不能少一粒，为什么还要给他扛进仓去？应该他们自己来拿才对！今年秋收后，谁家都不要送租子！”当时有个胆小怕事的佃客贺明科说，我不敢这样办；惹他冒火了，夺了佃，我全家就要饿

饭啦；我说：“只要大家齐心就办得到；出了鬼，我去承当。”当时大家就发了誓，“哪个不依今天商量的做，今后无子孙上坟。”农历九月间，收割结束，杨永康的三个老婆来催交租子，胆小怕事的贺明科就向她们反映了五人一起发誓的情况。三个老婆立即来找我扯皮，我同她们吵了一场，她们气愤地返回龙广。这时在反动将领薛岳的部队当营长的杨永康回家来了。第二天我在龙广场坝理发还未结束，杨永康的四个狗腿子就围上来，用我包头的帕子，把我捆绑了去见杨永康。杨大发雷霆，用一根棕索把我捆结实，拉去绑在镇公所一根大柱上。不多时，被王秉璽同志看见了，向我问清来由后，即去找杨营长交涉释放，并在杨迟疑不定之时，就跑来把我放走了。

约一星期后，王秉璽派吴廷才来通知我去孔家坝吃饭，当时提到送租的事，我不禁伤心流泪；他安慰我一阵，向我指出：要同地主恶霸斗，必须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否则是吃不消的。第二天临别时，他送我两本油印文件：一本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本是《怎样做共产党人》，并一再叮嘱要保密，不要让人知道。这期间，他正以组织帮会的形式发动群众，已在孔家坝一带聚集了两百多人，当时他就叫我负责五台的工作。从此，我就和他经常在一起搞地下活动，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力量，打击反动势力。

一九四九年三月，贵大学生马天德由贵阳回家路过兴仁，看见贵州省第三行政区独立三营的招兵布告，便来找我

接洽，随后我们去找王秉璽商量。商量结果是指派我打入伪独立营，掌握武装，等待时机。我即去独立营与罗一农营长面晤两次，在取得了连长委任状后，就正式开始征集士兵，经半个月时间，集中了九十八人入伍。四月三日拂晓，我带领队伍由龙广出发，当天抵兴仁专署报到。第二天清晨，专员谭本良、营长罗一农来训话。唱了一通反动调子后，讲明新兵连要先徒手教练三个月后才发枪。两个月后，我们枪还未弄到手，王秉璽和王雄在永和领导暴动了。他们在两路敌军向永和进袭的当天，为争夺大洞丫口的制高点，战斗了一个下午，制高点被我夺取。紧接着有王继勋、王汉中报知：“龙广街上敌人空虚，敌人在镇公所内存放有枪支弹药。”王秉璽同志随即率三十多个同志绕道至龙广夺取枪支弹药，不幸被敌守兵发觉，开枪击中韦金、王安民二同志。他们身负重伤后被俘，受尽了酷刑，壮烈牺牲。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深夜，我在兴仁得到通知，立即由伪营逃避，几经辗转，躲过敌人的多次搜捕，方摆脱了危险。

敌人三次来洗劫我的家，撵走了我的妻儿老小，挖掉了我母亲的坟墓。我听到这些消息，悲愤万分。在党的帮助下，同年五月三十日，我星夜奔向罗盘区，向中共罗盘区地委书记刘青同志讲明来由。经高乐同志查明情况后，我持罗平县临时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参加了第六期干训班学习。一个半月结业后，我与王秉璽、贺明亮、查定邦三同志见了面。此后，组织上派王秉璽同志往广西搞地下活动，我和贺、查等同志奉调滇、桂、黔边区主力部队二十二团。后主